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 中西重大哲学命题研究

刘月霞 刘伟涛 著

WEIWUSHIGUAN
SHIYUXIA DE
ZHONGXI ZHONGDA
ZHEXUE MINGTI YANJIU

河北人民出版社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 中西重大哲学命题研究

刘月霞 刘伟涛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西重大哲学命题研究 / 刘月霞,
刘伟涛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 - 7 - 202 - 10798 - 0

I. ①唯… II. ①刘…②刘… III. ①比较哲学—
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 ①B1 -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8352 号

书 名	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西重大哲学命题研究
著 者	刘月霞 刘伟涛

责任编辑	唐 丽 高 菲
美术编辑	于艳红
责任校对	余尚敏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第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61 000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2 - 10798 - 0/B·234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序

哲学的功能与中国哲学工作者的任务

刘月霞老师《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中西重大哲学命题研究》一书，选取了对人类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中西哲学命题予以探讨。其中涉及它们产生的历史背景、内涵与外延，对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维能力、认识处理问题方法等方面的巨大影响，及其如何进一步反作用于社会，最终渗透到人类自身的生活，对此作了全面的分析与评析。

此书以事实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哲学是人类文化的核心。随着社会的进步，文化对社会的巨大反作用日益彰显出来。哲学这一看似无用，实际上有大用的学问对社会进步的意义也更加凸显出来。

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划时代的大科学家、大思想家爱因斯坦被施威策问道：曾经在人类历史上极其辉煌的中国，为什么在进入近代以后在科学技术方面对世界几乎没有什么贡献？他回答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奇怪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部做出来了。”^①

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爱因斯坦没有把一个国家的科技落后归罪于政治家对其不重视，也没有责怪企业家缺乏远见，未能加大对科技事业的风险投资，甚至没有埋怨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创新能力低，而是认为由于中国的哲学家、思想家未能给社会提供好的思维方式和正确的价值取向，而且认为中国古代的贤哲也不可能提供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①《爱因斯坦文集》第 1 卷，574 页，商务印书馆，1976。



这种说法虽然不无值得商榷之处，但其中强调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意义和对中国传统哲学存在的致命缺陷的分析无疑是非常深刻的。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根本不同在于：古希腊已有相当发达的商品交换，政治上实行的是奴隶制民主制，西方哲学的奠基人大都出身于贵族，而且除苏格拉底外，几乎无一不是科学家，他们对数学、天文和物理都有很高的造诣。据说柏拉图学园门口就写有“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亚里士多德更是集西方古代学术之大成，他的生物学研究甚至可以说是开了西方实验科学的先河。这种情况使他们可以不慑于权威，没有生计之忧，完全从好奇心出发，沉湎于对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思辨探究，使他们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与自然科学融在一起，想弄清楚天地万物的根源（本体论），具有以求真为目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特点，崇尚批判创新、有独立见解，重沉思、反思、玄思，使得对思维能力的要求也特别高。就是近代西方哲学的一些领军人物也还保持着这一传统。如笛卡尔发明了解析几何，莱布尼茨创立了微分学，斯宾诺莎对光学很有研究，洛克精于生物学和医学，培根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康德在自然科学好几个领域的成就都得到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肯定。虽然近代哲学发生了方向上的转变——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但这种转变其实也是为了弄清楚人有没有能力认识世界，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所以，西方典籍中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方面的著作极多。这也是西方科学技术能飞速进步，国家繁荣富强的根本原因。而中国古代是农耕社会，中国哲学的奠基者们大多为士人出身，很少有家境非常殷实的。孔子少贱，庄周家贫。他们绝大多数人都要靠为统治者服务维持生计。故“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弟子虽饥不忘天下”。因此，中国哲学家一开始就以探究道德政治为主，研究的主要是修身治国之道。这样的哲学在价值取向上必然以权力为本位，提倡“学而优则仕”，从而重实用而不重玄想，对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少有兴趣而过于强调实用，这就使得通过想了又想——沉思、反思、玄思追求那些表面上远离现实的纯粹知识之风难以形成，纯粹科学的兴起也就势必为时势所不容。中国哲学的奠基人不仅很少自己本人也是科学家，而且他们从来不关心甚至瞧不起自然科学。虽然近代以来，提倡学以致用时，学也包括自然科学，

但由于太过强调用，使得中国的学缺乏深厚的根基，结果必然是既无学也无用。

当然，在中国早期哲学家中也不是清一色全是如此。如先秦名家和后期墨家就对纯知识，对逻辑做过较多的研究。惠施的十大辩题及公孙龙的《坚白论》《白马论》《指物论》等著作，都是以纯粹的知识概念为主，很少涉及政治伦理内容。但这种纯粹以分析概念、范畴为主的名辩思潮，从其产生就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所不容，遭到了来自儒道两大家的尖锐批评。道家说它“弱于德，强于物……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及，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也”。^①连对中国式的形式逻辑的建立作出过贡献的荀子，由于受的毕竟是儒家的教育，也批评名家是“蔽于辞而不知实”。这使以分析概念、范畴为主的名辩思潮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了一个短暂的时期，而且影响极为有限。

在中国文化史上对形式逻辑研究最多、贡献最大的要数以《墨辩》为代表的后期墨家。他们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水平，对时间、空间、运动等范畴作了哲学概括。他们不仅注意概念的准确性，也很注意概念与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提出了“以名举实，以词抒意，以说出故”^②的判断和推理原则。他们强调使用概念要反映客观实际，判断要正确，论证要充分。他们还把概念加以分类，提出“达、类、私”三种不同层次的等差概念，为进一步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创造了条件。从思维方法上看，它完全不同于儒家和道家，其特点是抽象层次高、逻辑性强。但它也同样未能发展起来。特别是秦汉以后，随着儒学经学的发展，后期墨家很快被淹没，变成了绝学。

总之，在中国文化史上虽然也曾出现过重纯粹知识、重逻辑的先秦名家和后期墨家，但他们都未能进入中国文化的主流。他们的学说尚未来得及展开就夭折了。在中国文化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重在践履、对纯知识和逻辑不感兴趣的儒家学说。他们总是强调“学以致用”，后来甚至发展到要“立竿见影”的地步。过于重视实用，势必思辨之风难以发扬，整个

①《庄子·天下篇》。

②《墨子·小取》。



民族的思维能力很难得到提高，一时看不出其应用前景的纯粹科学的兴起亦必为时势所不容。爱因斯坦曾经作为经验之谈十分正确地指出过，探索得愈是深入，我们的理论所包罗的范围变得愈是广大，那么，在决定这些理论时，经验知识所发挥的作用就愈小，而对抽象思维能力的依赖就愈强。一个没有哲学家能培养起全民族对纯粹知识的浓厚兴趣，为民族提供严密的逻辑体系，使整个民族具有很高的抽象思维能力的国家，又怎么能指望她在世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方面有自己很高的地位呢？这种情况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又怎么能指望在知识经济时代即将来临的情况下，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能在未来知识创新中有大量成果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后来居上，站到世界前列呢？

其实，这一点早在西学东渐第一波，明末清初一些有眼光的学者通过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特别是看到为西方人提供了严密的逻辑体系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亚里士多德的《名理探》之后就认识到了。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文化“空疏”，西方文化“实用”，是“真修实学”。特别是他们认识到作为中西文化科学基础的思维特征上的差异在于，西方文化具有“由数达理”的公理化的形式逻辑和思维方法，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科学所以停滞不前，原因是其基础缺乏建立在逻辑公理系统上的数学。用徐光启的话说：勾股定理“旧《九章》中有之，弟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勾股义》序言）。“《几何原本》能言其义也”（《题测量法义》）。特别是他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名理探》认识到，“西云婆禄锁费亚（即哲）乃穷理诸学之总名”；“名理乃人所赖以贯通众学之具”。遗憾的是，这一深刻的见地始终未得到国人的普遍认同，所以时至今日，仍有强调它的必要。中国要想飞速发展，就必须彻底改造我们的社会文化土壤，特别是在作为其核心的哲学思维方面来一次根本的革命，吸取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中一切好的东西，彻底抛弃我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一切陈旧、过时的东西，把我国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和西方文化、哲学中好的东西有机地融合起来，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的、先进的哲学基础，这是我们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实际上，爱因斯坦在这里将近代科学发展的原因归结为需要哲学家为

民族提供严密的逻辑体系和重视系统实验的价值取向。由于他是在民主已有一定程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讲的，特别是对于他那样有威望的大科学家，加之他后来搞的又是远离现实的统一场论的研究，所以他体会不到民主、宽容的外部环境也是科学发展不可缺少的内在需要。一是科学创新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性劳动，不同于体力劳动，它不可能在皮鞭、刺刀的威逼下把智力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只有在愉悦的心境下才可能有灵感，进行冷静、深入的思考，从而取得突破；二是真正的科学探索过程中的失误、挫折、错误总是要远远多于最终成果的结果。因此，科学研究必须有宽松的环境、民主的氛围；第三，科学内部不同学术观点的平等讨论、争论必是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规律。从来“真”都是民主的产儿，“假”是愚昧和专制主义不可避免的私生子。因此，在封建专制主义影响深重的国家，要想科学快速发展，还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扩大民主。

众所周知，科学与民主是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两翼。知识创新、科学进步是生产力提高、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前提。而民主，即人民当家做主，每个人不仅有权决定自己的一切，同时他还是与其他人共同组成的社会、国家的主人，它既是协调、整合社会各阶层利益，使社会保持稳定、作为一个健康的机体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加快自身进步的手段，更是社会每个公民都具有的不可渡让的权利。

民主和科学虽领域不同，但互相依存。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科学。科学技术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制约，就会危害社会；而民主不在科学理性指导下进行，不在法律框架内行动，不受道德约束，人人都按自己的需要和意愿行事，就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人人自危。老百姓别说做国家的主人，连自己的基本人权也不可能保证。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不可能进步。

科学与民主作为一种文化，其根子也在哲学。西方重科学与民主是其哲学思想的必然产物。在中国科学与民主之所以难兴，从根本上讲必是由中国的哲学传统决定的。中国先哲最关心的是人间治乱，其理想就是保持天下太平。因此其学说不仅不重实用，而且集中在道德政治。他们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只有依靠权力。这不能不使学术研究者缺乏独立人格、



平等精神。要维护天下太平，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让大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安于自己的命运，所以它从根子上就存在着严格的官位等级制。两千多年来，它已渗透到每个中国人的骨髓和每一个细胞，连那些把儒学捧到无以复加的地位，甚至想恢复它的国家地位的新儒家们，在谈到科学与民主时也提出要“返本开新”，这表明他们也承认，在原来的儒学中是没有科学与民主的。它本身就不包含这种东西，又怎么能开出这种新来呢?!

我的结论是，科学与民主是社会飞速进步的两翼，是人类解放最有效的武器。恰恰是这两样最主要的法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敢于否定自己，彻底改造社会文化土壤，特别是作为其核心与基础的哲学思想，因为哲学是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观、人生观的，直接关系到人的价值取向和思维能力的高低。这就是中国哲学工作者和所有文化人不得不面对的历史任务。

易杰雄

2013年11月于北大燕园



目 录 MULU

上篇：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西方哲学命题研究

◎第一章 “知识就是力量”与人类探索步伐的加速

- 第一节 培根关于知识的价值和功能阐释 (4)
- 第二节 知识形成过程中的主体心理障碍及清除 (12)
- 第三节 知识创新社会环境的营造 (26)
- 第四节 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知识力量 (32)

◎第二章 “我思故我在”与人类主体意识的高扬

- 第一节 “我思故我在”命题分析 (40)
- 第二节 人类理性的确立与张扬 (52)
- 第三节 “我思故我在”的近代演绎 (55)
- 第四节 “我思故我在”与欧洲现代哲学 (57)

◎第三章 “重估一切价值”与人类批判理性的确证

- 第一节 尼采之“重估” (66)
- 第二节 价值重构的主体、根基与目标 (77)
- 第三节 “重估一切价值”的影响 (83)

◎第四章 “人是生而自由的”与人类自由追求的持续

- 第一节 卢梭的“自由” (99)
- 第二节 自由的重建 (118)

第三节	“自由”的影响	(127)
-----	---------------	--------

下篇：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中国哲学命题研究

◎第五章 “学而优则仕”与人生目标的确立

第一节	关于“学”	(142)
第二节	儒家入“仕”的制度设计	(146)
第三节	“学而优则仕”命题的辩证分析	(152)

◎第六章 “天人合一”与中国社会的发展

第一节	“天人关系”的历史演化	(179)
第二节	“天人合一”的实现途径	(183)
第三节	“天人合一”与中国社会发展	(188)

◎第七章 “重义轻利、德本财末”与人格境界的塑造

第一节	“重义轻利、德本财末”思想的发展轨迹	(210)
第二节	中国传统义利、德财观形成的依据	(217)
第三节	义利、德财观辩证分析	(218)
第四节	“重义轻利、德本财末”的当代困惑	(230)

上 篇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西方哲学命题研究

YINGXIANG RENLEI LISHI JINCHENG
DE XIFANG ZHAXUE MINGTI YANJIU





第一章

“知识就是力量” 与人类探索步伐的加速

今天的知识分子仍然应该感谢培根！培根是第一个系统阐述知识的功能与价值的思想家，并明确倡导保障生产知识的知识分子的各种物质待遇和为其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他建立重在实用的科学实验方法，使英国进入科技迅速发展、经济腾飞的时代。在知识经济大潮席卷的今天，知识生产力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有力地证明了培根的远见与卓识。毫无疑问，培根将与时代同在！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揭示知识意义的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时期，培根根据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资产阶级渴求知识的强烈愿望，把“知识”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内容，系统地研究了知识的形成、价值和求知的方法等问题，提出了“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合二为一”“达到人的力量的道路和达到人的知识的道路是紧挨着的，而且几乎是一样的”^①即“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具有强烈时代精神的口号，建立了较完整的知识观，为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为人类历史前进的知识动力做了深刻的阐发。

第一节 培根关于知识的价值和功能阐释

人的知识和人的能力是相等的，人有多少知识，就有多少力量。培根关于知识的功能做了具体描述：

首先，知识是人类掌握自然、驾驭自然、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的强大力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培根一直认为，人是自然的役仆和解释者。役仆和解释者并非消极地、被动地受制于自然，而是以自然为第一存在物，积极地、主动地探索自然，探索自然的规律性，形成关于自然的知识。人类探索自然的目的是使自然满足人类的需要以改善人类的生活，而达此目的的唯一途径就是人类充分利用自己的智慧，不断扩大和加深对自然的了解和认识，掌握自然的必然性，用新的知识武装自己。因为它可以“供给人生以新的发现和新的权力”，^②因此，只有抓住了自然的统一性，找到未知的东西，并通过知识反作用于自然，才能获得强大的力量，达到驾驭自然、统治自然、实现人类普遍利益的目的。正如B·法灵顿在《弗兰西斯·培根》中所描述的“人类统治万物的权力肯定是深藏在知识之中的；在知识里边蕴藏着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是帝王的财宝不能买的，他们的能力所不能指挥的；他们的情报总得不到这些东西的消息，他们的海员和探险家

^①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9页、47页，商务印书馆，1975。

^②培根《新工具》，113页，商务印书馆，1936。

也不能驶向这些东西的生长之地。现在我们在议论中统治着自然界，但是在需求中却受自然界的奴役；不过我们在发现方面能接受它的领导，那我们在行动上就可以支配它了。”^①

知识，反映了事物必然性、规律性的知识，是驾驭自然、改造自然、造福人类的力量。如何获得这些知识？培根认为，要从分析事物的因果关系入手。任何事物的存在、发展必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也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客观的因果联系反映的就是事物的规律，它往往通过一系列现象表现出来。因此，人们从直观的现象出发，正视并深入分析存在于事物中的因果联系，便会形成对事物规律性的正确把握，从质和量两方面增加人类的知识。有了正确的认识作引导，人们的实践活动便摆脱了盲目性而有了成功的保障，“由于形式（规律）的发现，我们就可以在思想上得到真理，而在行动上得到自由”。^②

其次，知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培根生长在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此时新生的资产阶级及新贵族，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非常关心生产、航海业、造船技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强烈要求发展科学技术。然而，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依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他们竭力贬低理性，拼命宣扬对基督教教义的盲目崇拜和信仰。这种崇拜和信仰，一方面，必然排斥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因为，经院哲学以维护最高权威“上帝”为职责，而认为对自然的研究是“损害人之尊严的事”，^③它“深怕在对于自然的研究中会找出某种东西来推翻或者至少动摇宗教的权威”。^④因此，宗教神学必然阻碍认识的发展，阻碍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另一方面，经院哲学把“圣经”称为“天书”，是“上帝启示的记录，句句都是真理，要人们以圣经为标准决定取舍，而知识为神学所包围、所窒息，人们的研究只限制在，甚至简直是囚禁在某些作者的著作范围之内的”^⑤。人们只能被动地引经据典，而不能主动探索真理，知识“只能谈论，却不能生产，

①转引自苏宁《启蒙人格——培根》，48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②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47页，商务印书馆，1975。

③培根《新工具》，85~86页，商务印书馆，1936。

④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37页，商务印书馆，1975。

⑤北大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38页，商务印书馆，1975。



只富于争辩，却缺乏工作”。^① 针对这种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状况，培根大声疾呼把哲学和科学从神学和经院哲学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使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为实际服务，实现科学和工业的“结婚”；号召人们告别权威，走出本本，深入到自然的深处，亲自到事实中去，把概念和公理从事物中引导出来。他深信，摆脱了经院哲学的束缚，科学一定能获得巨大的发展。培根的这些思想，对于摆脱精神束缚，打碎套在人类理性上的精神枷锁，解放人的思想，推动科学知识的发展，进而改变整个人类的精神面貌，带动社会的根本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培根从理论上肯定了科学知识对社会进步的价值和功能，并且断言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最高最可敬的统治是科学的统治。在所有给予人类的一切利益中，莫过于发现新技术。只有新的技术的应用，才能改善人类的生活。因此，发展科学技术，增进人类的知识，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也符合全人类的普遍利益。

除了从理论上对知识的功能作了详细阐发外，培根还具体描述了科学知识和各种发明创造对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在谈到中国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大发明时说道“这三件发现，改变了全世界的整个面貌和事物的情况，头一件在文字上、第二件在军事上、第三件在航海上，由于产生了数不清的变化，以至于几乎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显赫的人物，对于人类事务曾经比这些变化在加强人类事务上以更大的力量和影响。”^② 基于这一理念，培根主张，对于每一个有价值的发明都要为它建立雕像以永久纪念，并且要给发明者优厚的物质奖励和崇高的荣誉奖赏。

再次，知识对于治理国家来讲，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培根在论述知识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时，首先强调：只有拥有了渊博知识的最高统治者，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和成就人民的幸福。这一结论的得出，是他在全面考察了历史的发展过程，有了充分依据的情况下做出的。具有辉煌历史的罗马帝国，自公元 51 年始至公元 180 年为止，共有六

^①培根 《新工具》，76 页，商务印书馆，1936。

^②转引自余丽嫦 《培根及其哲学》，100 页，人民出版社，1997。